

· 族群治理 ·

伊朗政府对跨界族群的“身份嵌套” 策略探析

——以库尔德人为例*

武桐雨

内容提要 百年变局背景下，跨界族群的身份政治问题成为影响一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伊朗是欧亚大陆多族群国家的代表，其少数民族与邻国接壤、跨界而居，形成跨界族群，在国内—国际互动中产生地缘政治与身份政治的双重影响。伊朗利用身份关联、政治互助和经济互补的内外协同优势，通过“身份嵌套”应对跨界族群身份政治诉求，处理族群冲突、化解民族矛盾，维护国家统一与边疆稳定。以库尔德人为例，伊朗对跨界族群实行的“身份嵌套”策略具有内外两重性：对内塑造“国族身份”，强化库尔德人对国家的向心力，弱化离心力；对外塑造“统一多民族伊斯兰国家身份”，开展睦邻外交，反对库尔德分离主义。伊朗的“身份嵌套”策略多管齐下，有效避免了民族问题政治化、经济问题安全化、国内问题国际化和边疆问题复杂化，实现了维护民族团结、防范境外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对伊朗“分而治之”的目的。伊朗对跨界族群库尔德人的“身份嵌套”策略，为多族群国家妥善处理跨界族群分离主义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 伊朗库尔德人 “身份嵌套” 跨界族群 身份政治 睦邻外交

作者简介 武桐雨，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博士后、伊朗德黑兰大学法律与政治科学学院国际关系访问学者。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4批面上资助”（2023M740735）的阶段性成果。此文曾宣读于2023年“第六届中东研究青年学者工作坊”。感谢冀开运、孙德刚、杜林泽、余纲正以及《西亚非洲》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不当之处由笔者负责。

民族问题在内外联动、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合力下，以不同的内容、形式和发展脉络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并从国家内部矛盾发展为国际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发展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①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处于攻势的西方国家在干涉南方国家内政时往往从民族问题入手，通过使民族问题国际化、经济问题安全化和人权问题政治化，干预反西方国家内政，从而达到“西化”和“分化”的目的。跨界族群（Trans – border Ethnic Group）是西方殖民统治的遗产和现代国家形成后的“副产品”，也是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同根异果”。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跨界族群成为削弱国家认同的潜在难题。尽管跨界族群可以成为维系国家间关系的纽带，促进所在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为其实现战略自主提供了生存空间；但同时，跨界族群也会成为他国利用的“工具”，引发族群矛盾、混乱乃至地区战争。尤其在后冷战时期，身份政治成为一股新潮，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人类社会。^② 跨界族群的身份政治问题本质上是民族问题，关乎多族群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建构，影响跨界族群所在国之间的关系发展。跨界族群问题关涉“身份政治”问题，但“身份”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被赋予新内涵。当自我认定的身份出现了政治化和安全化之后，跨界族群就会产生“身份政治”问题。进入21世纪，身份政治呈现复合化趋势，多重身份复杂交织。一方面，身份政治逐渐成为少数族群争取合法权利的武器，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成为少数族群挑战政权合法性的利剑——打着“自由、平等和人权”的旗号，煽动民族仇恨，寻求民族自治，甚至破坏国家统一。

伊朗面临复杂的跨界族群身份政治问题。2022年9月，伊朗库尔德族女性马赫萨·阿米尼（Mahsa Amini）因未戴头巾被捕入狱而引发大规模骚乱。抗议活动从伊朗库尔德斯坦蔓延到全国，参与者要求获得公民权利并结束国家对公民生活的干预。尤其在库尔德族群聚居区，和平示威演变为骚乱。在此次大规模抗议运动中，域外势力积极介入。部分库尔德分离主义者与境外反政府组织勾结，以伊朗少数民族的人权问题为由挑战政府权威。美国、英

^① 参见余建华著：《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331页。

^② 参见[美国]弗朗西斯·福山著：《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刘芳译，中译出版社，2021年版。

国等欧洲国家以库尔德问题为由对伊朗施压。但此次风波未上升为库尔德分离主义运动，也未导致国家的分裂。伊朗最终平息了因性别政治和库尔德族群政治而引发的骚乱，美西方国家对伊朗“分而治之”政策也失效。实际上，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及其盟友就对伊朗极限施压，综合运用军事遏制、定点清除、政治孤立、经济制裁、金融脱钩、长臂管辖、媒体宣传等手段，却鲜有策划伊朗跨界族群分裂主义的成功案例。伊朗如何进行族群身份整合、实现民族差异的“去政治化”、维护国家安全遂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于伊朗跨界族群问题，国内外学者做了一些初步研究。一方面，侧重“民族国家建构说”，重点关注伊朗各族群的国家认同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影响，聚焦伊朗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建立、形成与发展历程。^① 关于伊朗跨界族群的身份政治问题，既有研究主要从政治思潮角度探究伊朗跨界族群民族主义思潮的起源与发展，考察跨界族群民族主义及其实践对伊朗民族国家建构的影响^②以及伊朗政府对库尔德人的政策。^③ 另一方面，聚焦“睦邻外交国内根源说”。研究者主要探讨了跨界族群身份政治在伊朗外交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认为跨界族群不仅塑造了伊朗民族主义，还间接影响了伊朗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调整。^④ 总体看，现有成果未能解释为什么伊朗能够比土耳其、

① 冀开运、母仕洪：《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认同的建构及启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4期，第19~35页；另可参见〔伊朗〕穆罕默德·阿里·加塞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中的少数民族》（波斯文），载《战略研究》2012年第22期，第853~870页；〔伊朗〕萨利米·图卡马尼、贾利勒·哈泽瓦兹费·卡拉巴赫：《〈伊朗公民权利宪章〉与〈联合国少数群体权利宣言〉中少数群体权利地位的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4期，第203~230页。

② Alam Saleh, *Ethnic Identity and the State in Ir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Rasmus Christian Elling, *Minorities in Iran: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after Khomeini*,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Alam Saleh, “Nationalism and Islamism as Opposing Determinants of Iranian National Identity”, in Marco Demicheli and Paolo Maggiolini ed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 Nation: Rethinking Religious Nationalism in the Contemporary Islamic World*, Piscataway, NJ, USA: Gorgias Press, 2017, pp. 311 – 339; Rasmus Christian Elling and Alam Saleh,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Iran”, *Iranian Studies*, Vol. 49, No. 1, 2016, pp. 159 – 171.

③ [英国] 西万·赛义德、阿兰·哈萨尼扬、梁钦：《伊朗库尔德地区的人口政策》，载《土耳其研究》2019年第1期，第142~161页。

④ Ali Fathollah – Nejad, *Iran in an Emerging New World Order: From Ahmadinejad to Rouhani*,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David Yaghoubian, *Ethnicity, Ident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in Iran*,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4; 金良祥著：《伊朗外交的国内根源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

伊拉克和叙利亚更好地处理了跨界族群问题，以及为什么外部反伊朗势力难以在伊朗煽动民族分裂主义。鉴此，本文尝试以“身份嵌套”为研究切入点，构建联结跨界族群身份、边疆治理和邻外交的互动框架，研究伊朗如何通过实施对内和对外双重政策，成功实现了对库尔德人的身份整合，且有效防范了少数族群因身份差异而产生政治化趋向。本文的“身份嵌套”（Identity Nesting）策略是指联结跨界族群身份与边疆治理以及内外互动的身份整合机制，在“多元”中寻求“一体”，增强民族凝聚力，化解外部力量分而治之、挑动民族矛盾构成的威胁。本质上，“身份嵌套”是国家如何处理主体民族与少数族群权力分配关系，是国家对族群身份从“去政治化”到“再国家化”的过程。

一 伊朗库尔德人身份政治问题的历史演进与应对进路

伊朗是典型的多族群国家，其主体族群波斯人在地理上聚居在中心地区，少数族群多作为跨界族群分布在边陲地区。少数族群与主体族群客观上存在差异性，尤其是跨界族群身份政治问题，已成为伊朗国家建构以及对外关系发展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促使伊朗在邻国外交中开展国内—国际双重博弈。

（一）伊朗库尔德人身份政治问题的多元表征

伊朗库尔德人主要聚居在该国西部地区，与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库尔德人连为一体。库尔德语属于印欧语系。在宗教信仰方面，伊朗库尔德人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在近代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伊朗库尔德人的族群身份认同受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而起伏不定，具有融合与分离的双重性。

第一，库尔德人身份诉求的强弱与中央政权的盛衰密切相关。一战后，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中东地区出现权力真空，伊拉克和土耳其库尔德人独立运动此起彼伏。伊朗库尔德人也跃跃欲试，其中发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希姆科（Ismail Agha Simko）叛乱就是一次带有部落色彩的民族独立运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对内实施波斯化和现代化，同化温和的库尔德人，增强伊朗国家认同，对外则与伊拉克库尔德人结成准同盟，打压本国库尔德人。1946 年 1 月，伊朗库尔德人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自治政权，成立马哈巴德共和国。它不仅是伊朗库尔德内部政治力量和外部力量联合的结果，还是

伊朗库尔德人基于身份认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一次成功尝试，库尔德民族认同感在此期间极大提升，成为现代库尔德民族认同的顶峰。^① 同年 12 月，在伊朗军队的打击下，马哈巴德自治政权被推翻。此后，伊朗库尔德人内部逐渐由分歧转向分裂，其民族认同感弱化。1975 年，伊朗和伊拉克签订《阿尔及尔协议》(1975 Algiers Agreement) 后，一部分伊朗库尔德人移民至伊拉克，伊朗库尔德分裂主义运动寿终正寝。

第二，库尔德人的身份政治是伊朗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霍梅尼表示将支持少数族群自治权。库尔德民族主义情绪被调动起来，成为支持革命、反对巴列维王朝的重要力量。1978 年 11 月 5 日，霍梅尼在法国巴黎向“库尔德斯坦的穆斯林人民”发表讲话时说：我向库尔德斯坦的穆斯林兄弟致敬，他们和其他兄弟一起加入伊斯兰革命运动；他们勇敢起义，勇敢地与魔鬼斗争，给伊斯兰的敌人和腐朽的旧政权制造了麻烦。^② 在库尔德人看来，巴列维政权的倒台是一个重新获得自治权的机会，因为新政府可能会提高库尔德人的地位和待遇。^③ 1979 年 3 月，伊朗库尔德民主党 (Kurdistan Democratic Party of Iran) 结束地下活动，正式确立在库尔德斯坦的地位；伊朗库尔德人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中反对巴列维王朝的中坚力量。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和其他库尔德组织向霍梅尼领导的革命政府提出了八项自治计划。^④ 这些自治要求相对温和，并不损害中央在地方的财政、国防和外交权。即便如此，霍梅尼领导的革命政府却将库尔德人的要求视为对国家完整性的威胁而予以拒绝。新政府与库尔德武装之间爆发了小规模冲突。同时，伊斯兰革命期间团结起来的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科马拉 (Komala Party of Iranian Kurdistan)、库尔德部落首领以及库尔德逊尼派人士也产生了分歧。1980 年，随着两伊战争爆发，伊朗库尔德人再次出现分歧。尤

^① 伊朗库尔德民主党于 1945 年成立时提出了八项自治计划，激发了库尔德民族主义。See James Ciment, *The Kurds: State and Minority in Turkey, Iraq and Iran*,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6, p. 1; Abbas Vali, *Kurds and the State in Iran: The Making of Kurdish Identity*, London & New York: I. B. Tauris, 2014, p. 81.

^② Ruhollah Khomeini, *Sahifeh – ye Imam*, The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Imam Khomeini's Works, Vol. 6, 2008, p. 339.

^③ Allan Hassaniyan, *Kurdish Politics in Iran: Crossborder Interactions and Mobilisation since 194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79 – 97.

^④ Koohi – Kamali,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urds in Ir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193.

其在是否与革命政府合作的问题上，库尔德人内部派系林立，无法和解，士气低落。不仅如此，伊朗库尔德人与土耳其和伊拉克库尔德组织也貌合神离、渐行渐远，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陷入停滞。

第三，库尔德人基于寻求自治的历史记忆而谋求独立的现实可能性。冷战结束后，伊朗库尔德人仍深藏其寻求自治的历史记忆。短暂的马哈巴德共和国成为当代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理想寄托，使得伊朗库尔德斯坦被认为是库尔德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摇篮。^①而伊朗伊斯兰革命重新激发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独立情绪^②，伊朗库尔德精英并未放弃他们的自治主张，他们开始反思其斗争手段的成效。与反殖民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同，库尔德精英根据冷战后的人权话语以及隐含的自由民主规范来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伊朗政府也注意到拉拢库尔德人对选举政治的重要意义。1997年，伊朗改革派政治家哈塔米在竞选时提倡公民权利，承诺为少数族群和宗教少数派提供更多政治和社会自由。库尔德人组织希望获得更多自治权，呼吁库尔德人投票给哈塔米。^③2013年，温和派总统鲁哈尼也曾对库尔德选民许下“扩大公民权利”的承诺，以此争取库尔德逊尼派的选票。事实上，身份政治问题既反映了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国族主义和族群主义的矛盾，也体现出多族群所带来的复杂政治生态。尤其对存在跨界族群的多民族国家来说，伊朗当政者将维护国家的统一视为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由此努力统筹国家利益与兼顾族群地方利益之间的关系，避免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滑向分离主义。

第四，伊朗库尔德人政治参与受到邻国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外溢影响。在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话语建构中，泛库尔德团结被称为“库尔德性”(Kurdayıfı)，是一种基于血缘、地理、历史与文化亲和力的复合体。这种身

① Allan Hassaniyan, *Kurdish Politics in Ir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② Sabah Mofidi, “The Left Movement and National Question: From Romanticism to Realism”, *Journal of Ethnic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 3, No. 1, 2016, pp. 20–48.

③ 有关哈塔米时期“公民社会”的研究，参见蒋真：《从伊朗内外政策看“哈塔米主义”》，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3期，第54~56页。另有研究认为，伊朗伊斯兰政权并未履行革命期间对库尔德人的承诺，而是继续将库尔德人以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视为局外人，并视为对伊斯兰共和国构成潜在威胁，如借用伊斯兰话语、宗教意识形态、伊斯兰团体和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利用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反对库尔德运动。See Sabah Mofidi,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Eastern Kurdistan: With a Focus on Maktab Qur'an During Iranian Revolution, 1979”,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Law*, Vol. 8, No. 3, 2015, pp. 36–50.

份跨越国界，被视为泛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虽然不一定意味着追求独立建国，却成为争取库尔德人权益的一种政治口号。^①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进步和“库尔德之春”此起彼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似乎正在变为现实。库尔德人表现出强大的跨界联系和族群网络，尤其在“大库尔德斯坦”地区拥有数量繁多、关系复杂的各类武装团体与社会组织，其频繁的跨界互动引起所在国的警觉，如在伊拉克北部建立的库尔德自治区成为伊朗流亡库尔德人的大本营。同时，库尔德人跨界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系不断增强，跨界互动日益频繁。伊朗库尔德人因生活、工作、学习等需求，经常前往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而高度自治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地区为身处“异乡”的伊朗库尔德人提供了“想象空间”。如何防止跨界族群离心离德，是摆在伊朗政府面前的重要议题。

跨界族群的身份认同具有多元性，这决定了跨界族群的观念和自我认知的复杂性。伊朗库尔德身份认同包括族裔、宗教、政治和文化认同等多重维度，这些问题相互交织，使伊朗库尔德问题复杂化。少数族群与主体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上的差异性，尤其是跨界族群与主体族群在地理空间上的分离，成为伊朗国家建构和民族团结的难题。

（二）当代伊朗政府对跨界族群的身份整合策略

跨界族群中的亚身份作为一种身份类别，代表着在一个由共同的血统、历史、神话、符号和文化习俗所界定的群体中的成员身份。它与国家行为体具有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② 当族群群体归属成为政治动员、竞争和冲突的工具时，它对政治将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跨界族群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挑战了现代国家认同。同时，当以族群为框架的政治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稳定、暴力或战争时，族群对国际关系至关重要。换言之，当跨界族群的身份高于所在国的国族身份时，身份政治便成为多族群国家的安全议题，产生民族隔阂，甚至引发民族仇恨，给国家治理带来难题；而当身份政治问题国际化后，便成为所在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关注的安全问题。如何直面跨界族群身份政治问题，通过自上而下、内外互动的治理进行身份整合，成为一国

^① William Gourlay, *The Kurds in Erdogan's Turkey Balancing Identity, Resistance and Citizenship*,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141 – 166.

^② 关于跨界族群的族群身份承认与民族权利问题，参见马俊毅：《现代多民族国家中民族权利的理论路径——基于族格的视域》，载《学术界》2015 年第 1 期，第 74 页。

巩固民族团结与抵抗外部干涉的重要挑战。

第一，伊朗政府重视国内库尔德人问题，采用“身份嵌套”整合策略。百年变局下，身份政治的兴起及信息技术的进步，影响世界各地区多族群国家的身份建构。事实上，各多民族国家实施的族群身份整合机制有所不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坚持“身份熔炉”，主族群不断同化亚族群；以伊拉克和黎巴嫩为代表的国家保持“身份沙拉”，主族群与亚族群处于对等位置；以利比亚、索马里和也门为代表的国家呈现“身份碎片”，主身份虚弱，亚身份走强，部落、教派、族群等身份凸显。就伊朗而言，该国的族群身份整合基于其国情、民情、社情特点。与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强烈话语不同，当代伊朗库尔德人问题主要表现为以“库尔德人身份+”为共同利益而开展的温和政治活动。一些库尔德人认为，政府造成了库尔德斯坦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裂；另一些库尔德人认为，波斯人是“一等公民”，库尔德人沦为“二等公民”；还有一些库尔德人认为，库尔德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未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面对库尔德人身份政治问题，伊朗政府在战略上高度予以重视，加强少数族群同主体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之间的联系，维护民族团结，实施“身份嵌套”策略。中央政府避免将伊朗国家的政治认同与库尔德族群认同对立起来，而是强调二者是主身份与亚身份、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的有机统一，亦即主族群对亚族群形成吸引力和塑造力，同时保留后者的亚文化特色。

第二，“身份嵌套”策略的目标指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伊朗库尔德人身份政治问题，本质是对国民身份的接受度。信任作为国家制度合法性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国家强化凝聚力的需要，是维护政权生存的保障，但增强社会凝聚力是一个需要不断培育和重建的持续过程。需要国家通过治理等方式促进和尊重有关团体的合法要求，并将其作为民族团结的基础。^① 伊朗领导人和官方文件中虽从未使用“身份嵌套”这一概念，政府甚至不认为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等跨界族群是独立的“民族”，而是认为他们是具有一定文化特殊属性的“族群”，所有这些族群都是“伊朗民族”的平等一员，都是波斯文明、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坚信“内因是变化的根本”，通过建构更大的身份叙事，以及通过内外互动建立“自我”和

^① Bhikhu Parekh, *A New Politics of Identity: Political Principles for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47.

“他者”的身份，将国家内部异质性的身份“嵌套”起来，像“套娃”一样形成多重复合身份。

第三，“身份嵌套”策略的实施具有内、外双向度特点。伊朗政府在识别和重塑跨界族群身份时，依靠国内（边疆治理）和国际（睦邻外交）双重手段，淡化族群身份，塑造国族认同，以伊斯兰教和波斯文明为情感纽带，形成身份整合，维护多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构建民族—宗教共同体和区域安全—治理共同体，从而达到族群身份“去政治化”和“再国家化”的目的。由此，伊朗对库尔德人的“身份嵌套”策略体现在国内政治与其邻国相关的国际层面之间的互动过程。具体而言，当代伊朗以“身份嵌套”策略进行具象的国族建设与抽象的穆斯林共同体建设，应对跨界族群多元身份的政治诉求，并通过与邻国互动不断调适政治身份。换言之，伊朗以边疆治理与睦邻外交相结合的方式，解决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进而推进以波斯历史认同、什叶派穆斯林宗教认同和伊朗国族认同相结合的共同体建设，使伊朗库尔德人族群认同与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相兼容。从图 1 可以看出，伊朗强化国家认同的目的是使国族认同的“主身份”与库尔德族群认同的“亚身份”具有兼容性。在处理跨界族群问题过程中，“身份嵌套”使伊朗成为一只“刺猬”，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力避外部势力的干预，预防域外力量打“民族牌”、实施分而治之。伊朗“身份嵌套”策略的实施主要依靠防御性的边疆治理与进攻性的睦邻外交双重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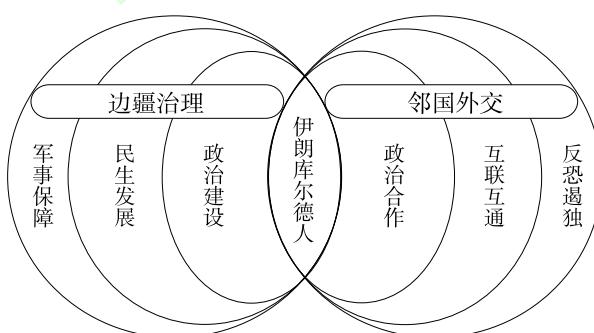


图 1 伊朗对跨界族群库尔德人“身份嵌套”策略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 边疆治理：伊朗对库尔德人践行“身份嵌套”策略的国内途径

伊朗跨界族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较为复杂，族群关系体现为“和而不同”。当代伊朗总体上延续了巴列维王朝时期的现代化改革政策，如强调波斯语国语地位、波斯民族主导地位以及伊朗国家认同优先地位等国家治理理念。但相比巴列维时期重点突出伊朗身份中的波斯元素，^①当代伊朗避免推行极端的身份政策（如否认一维和僵化的身份，强调一体多元）；倡导跨文化团结和同理心是伊朗族际身份整合的重要特点。对此，伊朗政府对库尔德人采取了比巴列维王朝时期更加包容的对政治和文化之怀柔政策。近年来，伊朗实施了多项脱贫减贫的民生项目，秉持“以发展促安全”理念，扩大就业，努力解决经济不平等、发展不平衡问题；为库尔德精英参政奠定基础，关注库尔德人的文化需求，包括在不同教育阶段教授库尔德语，以减少库尔德人的不满情绪。

（一）通过政治与文化相结合的手段淡化库尔德人族群意识

第一，因地制宜，重构库尔德人的族群分布。伊朗库尔德人主要以聚居和散居形式分布在伊朗西部地区。在行政管理上，中央政府保留“库尔德斯坦”的名称，表明国家对库尔德人的承认与尊重，但实则将库尔德人分散在西部四省，并与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卢尔人等少数族群混合而居。在民族分类上，当代伊朗宪法中的民族认同根据伊斯兰主义原则来定义，而非根据族群差异来区分。自萨法维王朝以来，伊朗各政权就延续了基于伊斯兰教和什叶派对伊朗身份的界定。近现代伊朗库尔德人的反叛组织以逊尼派库尔德人为主，什叶派库尔德人较少表现出族群身份政治特点。例如，霍梅尼利用库尔德人之间的宗教差异进行国家动员，反映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要基于宗派归属，使库尔德人难以“抱团取暖”。^②

^① Ghani Boloorian, *Alla Kok*, translated by Reza Kheiri Motlagh, Tehran: Resa Publications, 2003, p. 7; Sajjad Yazdani, and Agha Sajjadi, “The Kurdish Resurrection Society (1942 – 1945)”, *Journa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Art Research*, Vol. 6, No. 6, 2017, pp. 1 – 18.

^② Guenes Murat Tezcur and Peyman Asadzade, “Ethnic Nationalism Versus Religious Loyalty: The Case of Kurds in Ira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5, No. 2, pp. 652 – 672; [英国] 西万·赛义德、阿兰·哈萨尼扬、梁钦：《伊朗库尔德地区的人口政策》，第159页。

第二，在可控范围内扩大库尔德人的语言文化使用空间。与土耳其和叙利亚不同，伊朗对库尔德语持包容态度，未禁止使用，并将其视为国家主要方言之一。政府允许库尔德人在公众场合讲库尔德语，学校还开设了库尔德语言和文学课程。此外，伊朗政府重视什叶派节日加迪尔节（Ghadir）在促进库区宗教团结中的作用，将其视为“统一的轴心”，而非“分裂的轴心”。例如，伊朗政府要求相关机构在组织加迪尔等节日活动时，创新思路，通过公共供餐、城市装饰等活动，丰富库尔德民族文化，促进库尔德人与其他族群的交流融合，增强国家认同感。

第三，以伊斯兰为原则共塑宗教身份。伊朗通过强调“穆斯林兄弟情谊”和发挥“乌玛”（穆斯林共同体）的宗教号召力来强化伊斯兰身份，弱化库尔德人族群意识和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分歧，以实现“我们与库尔德人没有区别”的目标。^① 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赞赏库尔德人在反抗巴列维政权的斗争中所做出的牺牲，称“伊朗民族永远不会忘记库尔德兄弟的团结，以及他们在反殖民、反独裁的斗争中与邪恶的巴列维政权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伊朗的伊斯兰运动是什叶派—逊尼派兄弟情谊和全国各民族团结一致的象征。”^② 另外，伊朗强调战争和革命使库尔德人的身份意识与伊朗的民族身份融为一体。在伊朗当代史中，伊朗库尔德人曾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中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得到了伊朗政府的积极肯定。同时，伊朗政府强调在社会中创造“本国”和“外国”之间的二元对立，用来强化国家身份认同。^③ “在库尔德兄弟中，有许多伊斯兰革命的战友。也许可以说他们是那些人中的大多数……即使在今天，当他们来到伊朗时——他们旅行并与当地人交流——他们仍记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伟大以及伊朗政府对他们一贯的信任。”^④ 哈梅内伊是伊朗最高领袖，也是阿塞拜疆人，由此增强了政府在少数族群中的亲和力。

^① 《我们与库尔德人没有区别》（波斯文），载《伊斯兰革命仪式》第2卷，伊玛目霍梅尼（PBUH）编辑和出版研究所，2020年版，第403页。

^② Rouhoullah al - Mousawi al - Khomeini, *Sahifeh - ye Imam*, p. 165.

^③ Mahdi Mohammad Nia, “Discourse and Identity in Iran’s Foreign Policy”, *Iranian Review of Foreign Affairs*, Vol. 3, No. 3, 2012, p. 50.

^④ 《库尔德斯坦游牧民族首领和受托人会议上的发言》（波斯文），载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作品保存和出版办公室信息库网站：<https://farsi.khamenei.ir/speech-content?id=6834>, 2023-02-24。

第四，强化对伊朗历史身份认同的共同记忆，增加了库尔德人对伊朗国家身份的归属感。库尔德人与波斯人的共同历史身份，塑造了库尔德人对伊朗的历史认同感和心理归属感。在两伊战争中，伊朗政府高举“保卫国家不受伊拉克入侵”的大旗，强调所有人都是伊朗人，淡化了各自的族群属性。哈梅内伊时代，伊朗政府高度赞扬库尔德人在两伊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精神，增强了库尔德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豪感。在库尔德人佩什梅加烈士纪念大会上，领袖哈梅内伊赞扬库尔德斯坦人民的英勇气概，认为相较于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伊朗库尔德人是“历史上真正的伊朗人和抵御外国侵略的卫士”。^①

（二）通过促进库尔德人经济发展缓解其身份焦虑

失业问题长期困扰伊朗库尔德人，因此伊朗的经济发展聚焦在库尔德地区的就业和脱贫问题上。伊朗强调民族平等，认为跨界族群地处边陲，经济发展条件不足，政府有责任推动社会公平进步，维护跨界族群的发展权。中央政府对库尔德斯坦的经济发展规划是：以知识经济为基础扩大生产，创造就业；以团结为准绳推动库尔德斯坦的经济建设；创造就业是库尔德斯坦省的核心问题；^② 库尔德斯坦安全环境的改善取决于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改善。^③ 鉴此，伊朗政府采取了以下举措：

第一，制定针对库尔德斯坦的经济规划，努力将其打造成边境商业区或自贸区，以出口为导向奠定产业基础，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伊朗政府利用区位优势促进库区经济增长，激活边境贸易，利用边境出口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库尔德斯坦靠近伊拉克和土耳其，跨界而居的库尔德人存在文化共性，特别是其共同的库尔德地缘关系和血缘联系，为伊朗库尔德地区提供了经济发展潜力，如巴奈赫（Baneh）、马里万（Marivan）等地现已成为活跃的边境集市。库尔德斯坦省在马里万、巴奈赫和萨南达杰（Sanandaj）拥有海关口岸和边境市场，成为跨界库尔德人的贸易集散地。

^① Metin Yüksel, “Kurds and Kurdish Nationalism in the Interwar Period”, in Hamit Bozarslan, Cengiz Gunes and Veli Yadirgi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Kur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205–228.

^② 《库尔德斯坦发展文件》（波斯文），载伊朗库尔德斯坦省管理和规划部门网站：<https://ostan-kd.ir/?p=646>，2020-04-18。

^③ 《服务是库尔德斯坦的成功战略》（波斯文），载梅赫尔网站：<https://ostan-kd.ir/?p=5431>，2023-07-03。

第二，激发库尔德斯坦边境旅游业的发展潜力。伊朗库尔德斯坦拥有丰富的历史古迹和自然旅游资源，文化交流有助于提高边境地区的居民收入。例如，伊朗政府采取了促进库尔德斯坦手工艺品（卡拉什编织）产业的发展举措，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还构成伊朗大众文化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伊朗政府借此打造手工艺品边境集市，为库尔德手工艺者提供免费技能培训，且每年在萨南达杰的库尔德之家开办免费技术和职业培训成就展。技能培训成为伊朗跨界族群地区创造就业的重要平台，强化了伊朗库尔德人的向心力。

第三，通过战略传播来强化库尔德人的国家认同。伊朗政府强调民族团结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宣扬伊朗是各民族的伊朗，不是波斯主体民族的伊朗；伊朗用国族认同来形塑青年一代库尔德人的身份认同。伊朗政府对内培养库尔德精英和意见领袖，防止其通过“族群动员”来实现个人或团体政治目标、引发伊朗库尔德分离主义思潮；对外通过严厉打击库尔德反叛组织，形成高压态势，即通过内外双重手段对族群身份“去政治化”和“再国家化”，强化国家身份认同，增强库尔德人的现代国民意识。伊朗政府通过制度保障，妥善处理民族矛盾，防止族群身份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标签和动员工具，避免邻国及域外势力以身份政治操控伊朗民族问题。

第四，注重库尔德人才的培养。关于库尔德斯坦人才选拔和使用，伊朗总统莱希曾表示：“当务之急是选拔当地人才，必须雇佣库尔德斯坦省的高级人才。所有管理人员都应注意到，政府的政策是在各省积极利用高效、革命和有爱心的民族青年。”^①此外，莱希总统还强调要采纳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妥善解决库尔德斯坦省的民生问题。

（三）通过打击分裂主义加强民族团结

伊朗库尔德组织主要包括伊朗库尔德民主党、伊朗库尔德斗争组织（Organization of Iranian Kurdistan Struggle，又称“Khabat”）、科马拉、库尔德自由党（Kurdistan Freedom Party）和库尔德自由生活党（Free Life Party of Kurdistan）等。在伊朗库尔德人身份重构和民族主义觉醒背景下崛起的库尔德自由生活党是库尔德工人党（The Kurdistan Workers’ Party）的一个分支，最初活跃在土耳其库尔德地区，后迁移到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成为伊朗和土耳

^① 《莱希：政府决心降低库尔德斯坦失业率》（波斯文），载世界经济网站：<https://donya-e-eqtesad.com>，2022-07-08。

其共同打击的对象。库尔德工人党在坎迪勒（Qandil）山区的活动为库尔德自由生活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伊拉克建立联邦政府，提高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治地位，激发了伊朗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库尔德自由生活党和其他库尔德组织暗流涌动。这些组织将伊朗库尔德人生活的土地称为“东库尔德斯坦”（Rojhelat）。库尔德自由生活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保证库尔德人充分自治的联邦制伊朗，而不是神权制的伊朗。

第一，在应对突发性政治事件时，政府采取及时且有效的应对措施。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身份政治愈演愈烈，族群认同不断强化，伊朗政府尤其忌惮一些声称代表少数族群和宗派少数群体利益的运动（如人民圣战组织作为少数民族反对派团体的力量，公开挑战现政府）。2010年9月22日，在以库尔德人为主的马哈巴德市举行“神圣防御周”年度庆祝活动时，伊朗发生爆炸事件。虽然没有个人或团体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但伊朗政府将矛头指向库尔德自由生活党，称其为“反革命分子”。^①实际上，这种在伊朗西北部由库尔德自由生活党领导的库尔德武装分子与伊朗国家安全部队之间的暴力冲突，折射出伊朗社会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伊朗库尔德少数族群身份认同得以强化。此外，2022年9月16日，伊朗库尔德族女性马赫萨·阿米尼被道德警察拘留，死于警察局，“反政府”与“反体制”的抗议运动席卷全国。莱希总统表示，这场骚乱是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西方敌对势力颠覆伊朗的最新举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强调，伊朗的敌人应对骚乱负责，“民族团结和主权完整是使我们的敌人绝望的必要条件”。^②针对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伊朗官方也批准了“支持政府”的游行活动，不仅呼吁全国各族群团结起来对抗“敌人”的阴谋，还公开揭露了此次伊朗骚乱背后敌对势力的阴谋。^③随后，“一个民族，一面国旗”（“One Nation, One Flag”）的标语遍布伊朗。伊朗政府呼吁民众严防外部干涉，加强各族群团结。在此期间，科马

^① Chris Zambelis, “The Factors Behind Rebellion in Iranian Kurdistan”,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Sentinel*, Vol. 4, No. 3, 2011, <https://etc.westpoint.edu/the-factors-behind-rebellion-in-iranian-kurdistan>, 2023-07-08.

^② “Raisi Tries to Calm Raging Iran Protests as Death Toll Continues to Climb”,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raisi-tries-to-calm-raging-iran-protests-as-death-toll-continues-to-climb/>, 2022-10-04.

^③ “Iran Intelligence Ministry Reveals Secrets of Recent Riots”, <https://en.iran.ir/news/84900744/Iran-Intelligence-Ministry-reveals-secrets-of-recent-riots>, 2022-09-30.

拉和库尔德民主党试图通过利用大规模抗议运动制造骚乱，破坏政治稳定。对此，伊斯兰革命卫队炮击邻近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的科马拉阵地，逮捕了库尔德民主党部分党员，以防止“头巾事件”升级为国家安全危机。^①

第二，在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过程中，采用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手段。一方面，伊朗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维护民族地区稳定，迫使极少数分离主义者盘踞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或者伊朗边境山区。为应对库尔德分离主义卷土重来的威胁，伊朗部署了特种作战部队，以空袭的方式打击库尔德自由生活党等库尔德叛乱分子。伊朗还指责库尔德自由生活党充当外国情报机构的代理人。伊朗认为，美国正在与其盟国（以色列）一起策划一场民族分裂运动，以煽动伊朗国内民族分裂势力的社会抗议。在伊朗看来，美国或以色列一直图谋颠覆伊朗政权，鼓动库尔德人等族群的暴力活动。^②为此，伊朗将库尔德自由生活党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与逊尼派萨拉菲派武装分子联系在一起，作为打击的对象，防止民族分裂势力充当美、以的代理人。^③另一方面，伊朗政府在西部地区部署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巩固民族地区稳定。伊朗政府在西北地区部署多个指挥控制中心以应对各种威胁，预防库尔德地区街头骚乱的外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负责乌米尔等西北地区和克尔曼沙赫等西部地区安全。由于伊朗政府担心针对库尔德组织的惩罚性打击，可能会刺激其他民族地区也发生骚乱，故要求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的总部、民兵分支机构以及各种情报机构在库尔德地区建立城市监控和围堵系统。^④2011年7月，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地面部队在伊朗西北地区开展联合行动，打击反政府的库尔德武装组织。^⑤

第三，在边疆治理问题上，伊朗坚持“胡萝卜+大棒”政策，一手抓民

① 《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宣布对库尔德斯坦地区科马拉恐怖组织的总部发动炮击》（波斯文），载伊朗报纸网站：<http://www.irannewspaper.ir/newspaper/item/627706>，2022-09-26。

② 陆瑾：《从“十月抗议”事件审思伊朗二元政治结构的稳定性》，载《西亚非洲》2019年第1期，第79页。

③ “Pro-Ahmadinejad Cleric Killed in West Iran”，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dUSL485112_2009-09-13.

④ Farzin Nadimi，“Iran’s Military Options Against Kurdish Independence”，<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irans-military-options-against-kurdish-independence>，2017-09-22.

⑤ Sharif Sorkary，“A United States Marine’s View of the Artesh and IRGC”，edited by 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The Artesh: Iran’s Marginalized Regular Military》，Washington, DC: Middle East Institute Viewpoints, November 2011, p. 56.

生改善，一手打击分裂势力。当前，虽无迹象表明库尔德自由生活党会对伊朗现政权构成严重威胁，但地缘政治动荡、邻国库尔德问题外溢以及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对抗升级，将影响库尔德自由生活党的角色。尽管美国将库尔德自由生活党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但该组织将继续利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关系，抓住机会窗口伺机搞破坏。伊朗则继续通过更严厉的打压措施来应对库尔德分裂主义势力，实现“身份嵌套”。

三 睦邻外交：伊朗对库尔德人实施“身份嵌套” 策略的国际途径

应对共同威胁是伊朗跨界安全合作、开展睦邻外交的动力，库尔德人分离运动、恐怖主义袭击、跨境犯罪、毒品走私、拐卖人口等诸多问题是各方共同的安全关切。伊朗强调与邻国存在共同威胁、共同利益，呼吁相关国家采取共同行动，以跨界安全共享、利益共生维护跨界族群地区安全。同为伊斯兰国家，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在上述方面存在利益契合点，由此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打击民族分裂主义。伊朗在“身份嵌套”策略实施中，善于在跨界库尔德地区推动边境贸易，开展能源合作，与有关各方共同打击分裂势力。

（一）与土耳其加强全方位合作

库尔德问题是伊朗与土耳其的共同关切，是形成安全共识、加强合作安全的基础。伊朗与土耳其积极构建“统一战线”，认为邻国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人的任何独立运动都可能在本国引发类似的分裂主义，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故库尔德问题成为伊朗对土耳其外交的重要议题。2002年埃尔多安上台后，两国关系迅速改善，共同的库尔德问题成为双方的“黏合剂”之一。埃尔多安于2004年7月对伊朗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双方同意加强经济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伊朗和土耳其还签署安全合作协议，强调共同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及其支持者，定期召开安全会议，分享有关库尔德工人党和库尔德自由生活党活动的信息。2020年6月，伊朗和土耳其对伊拉克北部自治的库尔德斯坦地区开展联合军事行动，打击库尔德叛乱分子。上述安全合作表明，尽管2019年2月土耳其军队与伊朗的各种代理人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爆发冲突，但两国在叙利亚的分歧并不妨碍在其他地区开展合作。2020年

6月14日，土耳其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在伊拉克境内的庇护所，时任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抵达伊斯坦布尔，与土耳其达成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联合打击恐怖主义”的共识。^①6月16日，伊朗炮击了伊拉克埃尔比勒省靠近两伊边境的哈吉·奥马兰区，即库尔德工人党及其伊朗分支机构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的据点。^②

伊朗和土耳其在打击库尔德独立运动方面相互配合，形成默契。虽然土耳其偶尔指责伊朗在其边境地区制造安全问题、越境打击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但伊朗总体上保持克制，理解土耳其政府的合理关切，并对土耳其越境打击库尔德工人党采取默许态度，为伊朗与土耳其加强全方位合作奠定了基础。由于伊朗政府受到美国施压与国际制裁，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因此，伊朗通过与土耳其的合作来遏制西方介入库尔德问题，防止西方和以色列以土耳其为跳板，干涉本国库尔德事务。

伊朗对土耳其开展睦邻外交，还通过与土耳其建立高层互访和高层合作委员会、各部门联合委员会等机制，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地区政治对话。土耳其—伊朗高级合作委员会为土耳其与伊朗关系提供了制度基础。两国还以经贸为纽带，形成议题耦合，设立了联合经济委员会和商业委员会等双边合作机制，保障双边经贸合作的顺利进行。伊朗在两国边境的库尔德地区，通过经贸合作实现互联互通，如修建天然气管道、开展边境贸易等，保障西部边境安全，促进边境地区发展，挖掘两国的合作潜力，以此加强双边关系，防止库尔德边境地区陷入安全困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上，伊朗和土耳其的利益存在交集。两国反对库尔德分离主义者企图建立包括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在内的“大库尔德斯坦”；伊、土两国认为库尔德问题威胁各自主权，坚决反对库尔德人独立。

（二）与叙利亚政府共同遏制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

在叙利亚，伊朗与巴沙尔政府联合打击“伊斯兰国”，合作解决跨境族群问题。阿拉伯剧变后，虽然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未被西方颠覆，但实力大减。

^① 《伊斯兰革命卫队炮击伊拉克库尔德工人党》（波斯文），载伊朗伊斯兰世界网站：<https://iswnews.com>，2020-06-06。

^② “Turkey, Iran Carried Out Joint Operation Against Kurdish Militants: Minister”，<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turkey-iran-carried-out-joint-operation-against-kurdish-militants-minister-idUSKCN1QZ1CI>，2019-03-18。

叙利亚库尔德人在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的领导下，通过与美国结盟，积极打击“伊斯兰国”，并在巴沙尔政府力量被削弱的情况下，不断提高政治地位、拓展其地区影响力，进一步推进库尔德斯坦自治议程。中东地缘政治生态的变化，特别是所谓的“库尔德之春”，迫使伊朗加强睦邻外交，提高与叙利亚政府的合作力度。

伊朗与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推行相似的民族政策，共同反对美西方和以色列利用民族牌对伊朗和叙利亚“分而治之”。伊朗和叙利亚政府存在特殊关系，在政治、军事和财政上长期支持巴沙尔政府，共同打击库尔德分离主义，防止叙利亚库尔德人在美国的支持下形成事实上的独立。

叙利亚民主联盟党的武装部队“人民保护部队”（YPG）击败“伊斯兰国”后，巩固了对叙利亚北部主要库尔德人居住的城镇的控制，建立了自治政府，变成事实上的“罗贾瓦民主联盟”。2016年12月“阿斯塔纳和谈”后，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的三边谈判机制逐步成熟，伊朗和叙利亚在减少军事冲突和推动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等方面开展战略协调。在处理叙利亚危机问题上，伊朗与土耳其共同参与俄罗斯发起的“阿斯塔纳进程”，共同反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独立建国、殃及本国。伊朗密切关注叙利亚境内各种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2023年，随着叙利亚重返阿拉伯联盟，颠覆阿萨德政府的反对派团体未能建立统一战线，甚至趋于瓦解。它们分裂成众多敌对团体，伊朗对叙利亚民主联盟党心存疑虑，故默许土耳其多次跨境打击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目标。2024年12月8日，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攻占大马士革，阿萨德政权垮台，叙利亚进入新的政治发展期。占据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SDF）虽表示愿意与新政府合作，但并非完全解除武装，未来叙利亚东北部安全形势发展有待进一步观察。对此，伊朗识变应变，对内继续保持边境稳定，防止地区库尔德问题变化波及国内。

（三）与伊拉克以安全共识为基础防范境外库尔德问题反噬

早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国王就曾与伊拉克库尔德人建立战略联系，以遏制伊拉克对伊朗领土完整、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构成的威胁。^①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两伊关系从敌对转向友好，伊朗不仅与伊拉克保持官方联系，还

^① Arash Reisinezhad, *The Shah of Iran, the Iraqi Kurds, and the Lebanese Shi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 313.

与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政府（KRG）有着较为密切的经贸联系。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是伊朗重要的出口市场。双方的贸易额在 2014 年达到 80 亿美元，伊朗成为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方政府的第二大贸易伙伴。^① 即使是在各方对抗“伊斯兰国”期间，双方仍继续开展经贸往来。2015 年，双方展开贸易谈判并签订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石油与非石油贸易、管道建设、铁路修建等项目，以提升双方贸易交流与边境市场活跃度。2016 年，尽管两伊贸易额大幅度下降，但伊朗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贸易额仍达到 40 亿美元。^② 从民间的边境市场发展到官方的跨境贸易和投资，双方保持密切贸易联系和商业往来。

2017 年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举行独立公投，约 93% 的选民投了赞成票，对伊朗库尔德人分离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伊朗联合土耳其、伊拉克政府及叙利亚共同反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公投，不承认公投结果；伊朗只接受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自治，这是伊朗“身份嵌套”策略的实际需要。与此同时，伊朗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培植亲伊朗力量，借力打击反伊朗势力，阻断境外库尔德分离主义的渗透。在境外库尔德地区培养代理人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反遏制策略^③。以什叶派库尔德人为例，菲利库尔德人（Feyli Kurds）就成为伊朗民兵招募的主要目标。这些库尔德人聚居在伊拉克政府与北部库尔德人有争议的地区，伊朗通过招募当地什叶派库尔德人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伊斯兰国”肆虐期间，作为对“伊斯兰国”反什叶派意识形态的回应，伊朗什叶派库尔德人更加强调自身什叶派身份，与伊朗的什叶派国家属性一脉相承。伊朗利用它同库尔德工人党、库尔德民主党等紧张关系，各个击破，纵横捭阖，总体上达到了维护边疆稳定的战略目标。从伊朗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接触和支持可以看出，伊朗奉行代理人战争策略。总体而言，伊朗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培养亲伊朗力量可谓“一箭三雕”：一则，扩大伊朗影响力，阻止美国、以色列和沙特的渗透；二则，可压制国内库尔德武装团体发展壮大；三则，借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对伊朗商品的依赖，平衡

^① Bijan Khajehpour, “Assessing Impact of Shifting Iran – KRG Relations”,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10/iran-krg-economic-ties-trade-geostrategic-concerns.html>, 2017 – 10 – 16.

^② Ibid.

^③ Navin A Bapat, “Understanding State Sponsorship of Militant Group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2, No. 1, 2012, pp. 1 – 29.

境内库尔德分离主义力量。库尔德人作为伊朗的代理人（包括“直接代理人”或“间接代理人”）已成为伊朗降低成本、扩大自身战略空间、增强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方式。

2023年10月7日以来，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升级，伊朗的邻国土耳其利用这一时机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展开了空袭。这些袭击主要针对境外的库尔德工人党及其他支持者。土耳其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再次激发了跨界库尔德人的民族自决诉求。与土耳其“以暴制暴”、越境打击伊拉克境内库尔德工人党武装行为方式不同，伊朗政府通过睦邻外交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维护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稳定。在与伊拉克的外交中，伊朗宣扬本国民族制度的优越性——伊朗库尔德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有助于减轻外部环境变化对跨界族群的影响，使“身份嵌套”策略取得了一定成效。

四 思考与启示

作为跨界而居的族群，伊朗库尔德人身份政治问题的跨国性和复合性引发一系列国家安全与地区发展问题。随着土耳其库尔德人独立意识增强，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地位不断巩固，在全球化退潮、地缘政治回归和民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我们是谁”成为多民族国家必须回答的问题。“身份熔炉”“身份沙拉”“身份碎片”和“身份嵌套”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的几种主要形式。美国对少数族群的“身份熔炉”战略在中东难以实现；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的“身份沙拉”促进了战后伊拉克联邦政府的建构；叙利亚因长期战乱导致主体民族和库尔德人等形成“身份碎片”；土耳其以暴制暴、越境打击库尔德分裂主义势力，反而强化了库尔德人“身份政治”。相比之下，伊朗的“身份嵌套”策略更加成功，以下几方面做法值得关注：

第一，倡导民族国家共同文化价值观，推动国族身份整合。一国政权的持续需要保持政治稳定和增强民族凝聚力，而跨界族群的身份政治与分离主义密切相关。成功的分离主义不仅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还会发挥“示范效应”，鼓动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鉴此，伊朗政府在践行“身份嵌套”策略过程中，一方面伊朗政府强调穆斯林身份这个“最大公分母”，维护伊斯兰核心价值观。纵观伊朗历史发展，该国作为伊斯兰国家和波斯文明古

国，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不可否认，波斯—伊斯兰文化作为伊朗各族群共同身份和历史记忆，其强大的黏合力对这种多族群和平共处的民族关系起到了关键作用。由此，伊朗政府也将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用于治理国内库尔德问题上。伊朗政府抑制库尔德群体的族群身份，强调共有的波斯文明和伊斯兰价值观，呼吁增强民族凝聚力。另一方面，伊朗政府通过控制舆情来增加对库尔德人的影响力，强调通过民族团结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来塑造库尔德人身份认同。伊朗政府对内防止库尔德精英通过寻求提高民族群体的动员能力来实现个人或团体政治目标，引发伊朗库尔德身份政治危机，成为伊朗后革命时期的重要治理目标；对外通过强力打击库尔德反叛组织，形成对内施压的目的。换言之，伊朗政府通过内外双重手段对身份政治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塑造国家身份认同；通过制度保障，妥善处理民族矛盾，防止民族身份、族群身份成为政治的主要标签和动员工具，不给邻国及域外干涉势力以身份政治操控政局的机会。伊朗通过塑造外部“敌人”来加强国家身份建构，加强民众“内外有别”的国民意识。从实际效果看，伊朗的“身份嵌套”策略有效防范了库尔德族群认同对伊朗国家认同产生的稀释作用，尤其在民族自觉意识增强、身份政治大张旗鼓、库尔德跨界族群问题国际化的背景下，更加彰显伊朗在防范国内库尔德人问题失控进而影响伊朗国家认同虚化方面的战略意义。

第二，坚持以发展促安全，增强库尔德人对民族国家的凝聚力。针对库尔德人民族经济发展面临的失业和收入水平低“痛点”，伊朗政府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解决上述“难点”问题的利器。如前所述，伊朗政府通过出台有关有针对性的库尔德斯坦的经济规划，建设边境商业区或自由贸易区，推动边境旅游业发展等多重举措，释放库尔德地区的经济潜力，有力提升了国内库尔德人的归属感与向心力。此外，在以发展促安全理念引领下，建设性地管控库尔德地区的冲突，实施共同边疆地区的“发展政策”，遂成为伊朗参与跨界库尔德地区治理的重要方式。伊朗通过与土耳其的高层互访、设立了联合经济委员会和商业委员会等双边合作机制，保障了双边经贸合作的顺利进行。例如，伊朗和土耳其修建天然气管道、开展边境贸易等务实合作，对于保障伊朗西部边境安全、促进库尔德人地区发展、挖掘两国的经济合作潜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有利于防止边境地区陷入安全挑战的阴影。

第三，与周边库尔德人问题利益攸关国密切合作，确保本国边疆安全。应对来自传统和非传统领域的共同威胁是伊朗与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安全合作的有效基础。基于此，在实施“身份嵌套”策略中，伊朗政府对库尔德人的治理注重通过睦邻外交改善周边政治生态，以外交手段消解内部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潮。伊朗政府强调伊朗、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是“地区一盘棋”，各国存在共同安全和利益诉求，必须联合行动，共同打击库尔德分裂势力。伊朗密切关注境外库尔德人独立诉求所产生的威胁，对“外国势力”“外国代理人”“无身份者”或外国收买的少数族群间谍保持高度警惕，通过跨境打击分离主义，伊朗遏制“大库尔德斯坦”的思想得以传播。此外，伊朗因势利导，在库尔德问题上与土耳其开展合作，共同探索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出路，防止美国和以色列以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为情报收集站、向伊朗库尔德地区渗透；通过代理人借力打力，分化了各国的库尔德政治势力。由此，伊朗正是通过与邻国在反恐、地区安全等领域形成议题联系，平衡好国内议程与国际议程，内外联动使伊朗的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得以保障，成功应对了境外库尔德地区热点问题和边疆库尔德热点问题的双重挑战，塑造了“统一多民族伊斯兰国家”政治认同，总体上维护了民族团结。

总之，“身份嵌套”策略的本质是对“身份政治”进行去风险，而非彻底消除身份认同差异。伊朗通过多重手段进行身份建构，让不同族群的身份认同从属于伊朗国家认同。基于共同宗教和波斯文明，各族人民形成的伊朗政治共同体成为各族群的共同身份认同，为全体伊朗人提供心理上的归属感，使得波斯人、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等在共同的历史记忆、伊斯兰教信仰、波斯文明下和谐共处，形成“文化共同体”。伊朗的“身份嵌套”策略具有内外协同的特点，以“边疆治理”和“睦邻外交”为两翼，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形成超越族群认同的“伊朗民族”，进而完成“伊朗大团结”的身份建构。当然，各国少数民族问题情况各异，伊朗的做法与经验仅具有“他山之石”的借鉴作用。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Republic of Germany took a clear pro – Israeli stance; after reunification, Germany took the interests of both the Palestinians and the Israelis into account; and in the context of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Germany has reverted to the bloc's political stance. In the new round of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since October 7, 2023, Germany first unconditionally supported Israel, and then tried to balance its principled position of being pro – Israel and suppor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alestinians, and its position has shown a fluctuating process of finding a balanc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hange of Germany's position on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issue are complex: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formed in history, the importance it attaches to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Arab world out of its own econom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its own national positioning and its hope to push the European Union to realize “one voice” on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issue, and the need for a “one – voice” approach. Germany's intention is to enhance the voice of itself and the EU by strengthening its involvement in the Israeli – Palestinian issue. Although Germany intends to further enhance its influence in regional and global hot spot affairs by promoting the successful resolution of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issue, its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the obvious imbalance in German – Arab relations, the strong invol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extraterritorial powers, as well as the weakening of Germany's leadership within the EU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its position on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issue. These factors constrain Germany's claims and practices on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issue. As a result, Germany's resource inputs to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issue have been disproportionate to its outputs and have limited the impact of its policy ideas.

Key words: Germany's diplomacy; European Union; Israel;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Issue; new round of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Analysis of the “Identity Nesting” Strategy of the Iranian Government towards Trans – border Ethnic Groups: Taking the Kurdish People as an Example
Wu Tongyu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anges unseen in the century, the issue of identity politics among trans – border ethnic group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trend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ran is a representative of multi – ethnic country in Eurasia, whose minority ethnic groups border and live across border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forming trans – border ethnic groups, which have dual influence of geopolitics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domestic –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Employing a sophisticated “identity nesting” strategy, Iran strategically orchestrates the synergistic advantages emanating from internal – exter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encompassing ethno – religious identity association,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reciprocity, and economic complementarity—to systematically address the identity – political aspirations of trans – border ethnic groups,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amelioration of ethnic tensions, attenuating ethno – national discord, and preserving territorial integrity alongside frontier stability. Taking the Kurdish people as an example, the “identity nesting” strategy implemented by Iran towards trans – border ethnic groups has two layers: internally, to shape “national identity”, strengthen Kurdish people’s sense of national cohesion, weaken centrifugal force; externally, to shape “unified multi – ethnic Islamic national identity”, carry out good neighborly diplomacy, oppose Kurdish separatism. The “identity nesting” strategy of Iran involves multiple measures, effectively avoiding the politicization of ethnic issues, the securitization of economic issu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domestic issues, and the complication of border issues, achieving the purpose of maintaining ethnic unity and preventing external forces from using ethnic issues to divide and rule Iran. The “identity nesting” strategy of the Iranian government towards trans – border ethnic group, the Kurdish people, provides new ideas for multi – ethnic countries to deal with separatist issues among trans – border ethnic groups.

Key words: Iranian Kurds; “identity nesting”; trans – border ethnic groups; identity politics; good neighborly diplomacy

(责任编辑：李文刚 责任校对：樊小红)